

1978 BEIJING MEMORY



1978

10位官员的访谈实录

10位平民的命运追踪

大记忆

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苏峰◎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78 BEIJING MEMORY



1978

10位官员的访谈实录

10位平民的命运追踪

大记忆

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苏 峰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78: 大记忆—— 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 苏峰编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211-764-8

I. 1…

II. 苏…

III. 改革开放 - 史料 - 北京市 - 1978

IV. D6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2284号

1978: 大记忆—— 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出 版 人 和 龔

责 任 编 辑 贾宇琰

责 任 印 刷 尹 珺

出 版 发 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236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350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76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序

王蒙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四人帮”已经失势了两年，邓小平已经恢复了名誉与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唤醒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等待着中国的改弦更张，都等待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国在积累民心民气，中国在积累思考与决心，中国在积累全民族的对于要改革要发展要结束乱局的共识。同时又是“文革”造成的千疮百孔，天怒人怨，沉冤似海，问题如山，历史任务鲜明而又艰巨，历史在呼唤巨人与巨变。

人人在等待。人人在打探虚实、在发表见解、在有所期望，却又不无忧戚与顾忌。交头接耳与问询打探也是民意，民意如天，民心即是天心，民心不可侮不可欺，历史走到了它的转折点上。

我在这一年开始在《人民文学》与广东《作品》上发表了小说创作。我在这一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到北戴河改稿。我这一年恢复了与许多文学界的领导与前辈、文友的书信往来。我在这一年应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安排参加了十次团代会的采访报道工作。我在这一年与有关领导已经谈起了改变1958年划成“右派”的历史结论与调回北京的事。尤其是，我在这一年的11月，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为一系列文学作品正名平反的新侨饭店大会，我的找了不少“麻烦”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堂而皇之地得到了原来想也不敢想的积极的评价。

将心比心，我对一些老同志与社会各代表人物的1978年回忆特别觉得亲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民族那时是这样的泪流在一起，心跳在一起，劲使在一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了这个转折点，想起了这一个大年头，想起了邓小平与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的丰功伟绩，想起了人民的终将胜利，终于胜利。却原来我们从这样的起点上已经跨出了那么大的步伐，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本书可歌可泣，可感可叹，可圈可点，可呼可啸，抚今思昔，感慨系之。不容易呀。1978年，不容易呀，那一年与以后的30年。不敢怠慢呀，今天和斯后！

我们应该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贤先烈，对得起风云激荡的1978年与此后的30年，我们一定会把今后的事做得更好。

前言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经历记述，追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1978年，人们都在思考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在1978年横地切下一刀，露出的横截面是怎样的一幅风景？

1978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有些事情已经明显变化，有的事情还没有变。人们都在思考，都有各自的想法。有多少人能预见历史将在这一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市当时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干部，私下如何看待“文革”与毛泽东的个人功过？

如何认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两个凡是”问题？

率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思考之下？

在长达十几年的“学习”和“改造”后，被打倒的“右派”、民主党派以怎样的心情走到1978年并开始恢复工作？

国门初开，面对东西方的客人，我们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迎进来，又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

文艺界开始复苏，传统剧目、伤痕文学，又是怎样呈现出新旧时代的交替？

回城知青要上学、要就业，北京市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十位当年在岗的北京市中上层领导，他们分属宣

传、公安、外交、经济、教育、文艺、社会等各个部门。作为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些令人尊敬的老者将他们各自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片段毫无保留地呈奉，他们坦诚而真实的回答表明，一切皆有先兆，大转身的思想背景和群众基础已经具备。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1978年，命运开始转变

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时代大背景的最好反映。当1978年前后一系列大事发生时，大时代下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迎接这个转变。

1978年，初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被错划的老“右派”葛佩琦鼓起勇气来到作为“党员之家”的中组部。

1978年，农学家杨显东来到山西大寨，决心顶住压力揭开大寨盖子。

1978年，作为首批中国公派留学生，裴定一赴美留学。

1978年，在长安街上刷为“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标语的李冬民仍在狱中。

1978年，胡风的儿子张晓山终于可以上大学。

1978年，陈景润成为全民偶像。

1978年，监狱中的张扬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抓住了“平反”的契机。

1978年，高考恢复，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1978年，“文革”中的著名的“小学生”黄帅正在准备高考。

对这些人来说，1978年到底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转变？他们有过什么故事？后来又遭遇了什么？我选择并简要记述了上述十位“平凡”人物的经历。他们当初或者是“四人帮”的“红人”，或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者是插队知青、兵团战士，甚至“狗崽子”、“黑五类”……无论他们的经历有多么不同，他们的人生确实是从1978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是众多普通人的代表，也是时代变迁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1978年，大转折的象征意义

1978年是新旧时代的转折之年，旧时代的告别不是遽然转身，而是逐渐隐退；新时代的来临不是骤然降临，而是酝酿生发。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因此，书中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访谈和记述，我没有作过多修饰，只是平实记录并补充史料，目的是尽可能保存和重现部分历史面貌。希望读者能从这样一个真实的视角看到一些事实，了解一些真相，感受一个时代的跃动。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较多，必有纰漏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苏峰

2008年6月于团结湖畔

访谈篇：

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3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热烈展开。北京市从真理标准讨论的兴起到补课，是当时全国情况的典型。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刘导生跟我们谈了他的亲历、亲闻、亲见。

17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1978年的北京，在“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系统仍未全部恢复，而人们在“文革”中形成的打倒一切、无法无天的惯性一时也难以改变，北京市民处于“离家不放心，上班不安心，走路也担心”的状况。笔者就当时的社会治安及北京市公安局的举措等采访了老公安刘涌。

31 柴泽民

从驻美联络处主任到首任驻美大使

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12月15日，经过长期谈判，中美两国终于达成建交协议，发布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作为中方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积极参与了中美建交的诸多谈判，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45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

1978年的北京，正处在国门全部开放的前夜。来到北京的外国朋友们数量激增，我们也开始走出去，去往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笔者就1978年前后北京的外事工作访问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外事工作的王笑一。

61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

1978年的北京，发生了很多大事，其中一件牵涉最广的就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白介夫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市委常委会会议。笔者就“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情况采访了白介夫。

77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

刘冰，这位给毛主席写信、请邓小平两次转信的“三八式”老革命，1975年因为两封信被再次打倒。1978年6月，复出近一年的邓小平亲自为刘冰平反。就其1978年前后的经历，笔者采访了刘冰。

101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

1978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感动国人的领导人——胡耀邦。作为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这位“三八式”的老革命，却依然在北京市纺织工业局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直至默默无闻地带头离休。就1978年前后的经历和感受，笔者采访了李昭。

119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

她是抗日名将张自忠的女儿，她是一名中共和民革的交叉党员，她的经历特殊且丰富。在张廉云所经历的特殊历史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1978年，对于我个人，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与张廉云及几位民革老党员一起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宝贵记忆。

141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

1978年是思索酝酿的一年，思想分野的一年，也是新旧斗争的一年。当时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没有完全成型，人们都有各自的想法。笔者采访了时任北京市化工局副局长的王大明，就当时他所知道的方方面面等作了比较详细的回忆。

161 王雅琪

歌剧重演，我们必须重新排练

1978年的文艺界，告别了八个样板戏的时代。文艺界开始复苏、活跃，敏锐地将伤痕文学搬上舞台，并将人们爱戴的领袖人物搬上舞台。各种文艺作品，表达了人们对“文革”的一种朴素而又直接的情感认知。就这期间中国歌剧的复苏，笔者采访了中国歌剧女导演王雅琪。

记录篇：

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183 杨西光

公道有铁证，私欲存是非

1978年4月，复出后不久的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光彩的一页。他在正确的时间——1978年、正确的地点——北京、正确的岗位——《光明日报》总编，做了正确的事情——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 葛佩琦

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葛佩琦是“一二·九”时期北大学生领袖，在党的指示下潜入国民党军中，屡建奇功。建国后因为没人证明他的历史，又加上所谓的“杀共产党”言论，被打为“右派”，“文革”中更是饱尝牢狱之苦。1978年，正是这个传奇人物从悲剧走向喜剧的重要转折点。

205 杨显东

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洋博士

1978年开始，新中国建立伊始就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作为农业专家的洋博士杨显东第一个顶住压力，终于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推动了大寨时代向中国农业的最终告别。

211 裴定一

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生

1978年12月25日，首批52名中国公派留学生从北京机场飞赴美国。当年已经37岁，还算年轻人的裴定一恰逢其时，他的人生由此改变。以此为开端，海外留学的机遇重新向一代中国人敞开了大门。

215 李冬民

“文革”结束了，冤案仍在继续？

1977年1月，长安街上出现了几条醒目大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标语的作者是李冬民等十余位青年。李冬民为此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狱中度过三年，1980年得到彻底平反。

219 张晓山

胡风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胡风，这个沉重的名字广为人知。从1955年全国开始批判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的夫人梅志和三个子女——张晓谷、张晓风、张晓山度过了漫长的23年。1978年命运开始改变，胡风的小儿子张晓山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225 陈景润

1978年的全民偶像

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不仅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而且诞生了一颗作为全民偶像的科学巨星——陈景润！刚经过“文革”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可谓百业凋敝，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人民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

231 张扬

人民才是最终裁判者——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平反

上世纪70年代，小说《第二次握手》以手抄本形式在全国流行，因歌颂爱情和科学被“四人帮”罗织罪名，作者张扬于1975年1月被逮捕。直到1979年1月，因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张扬终于得以平反。

239 汪国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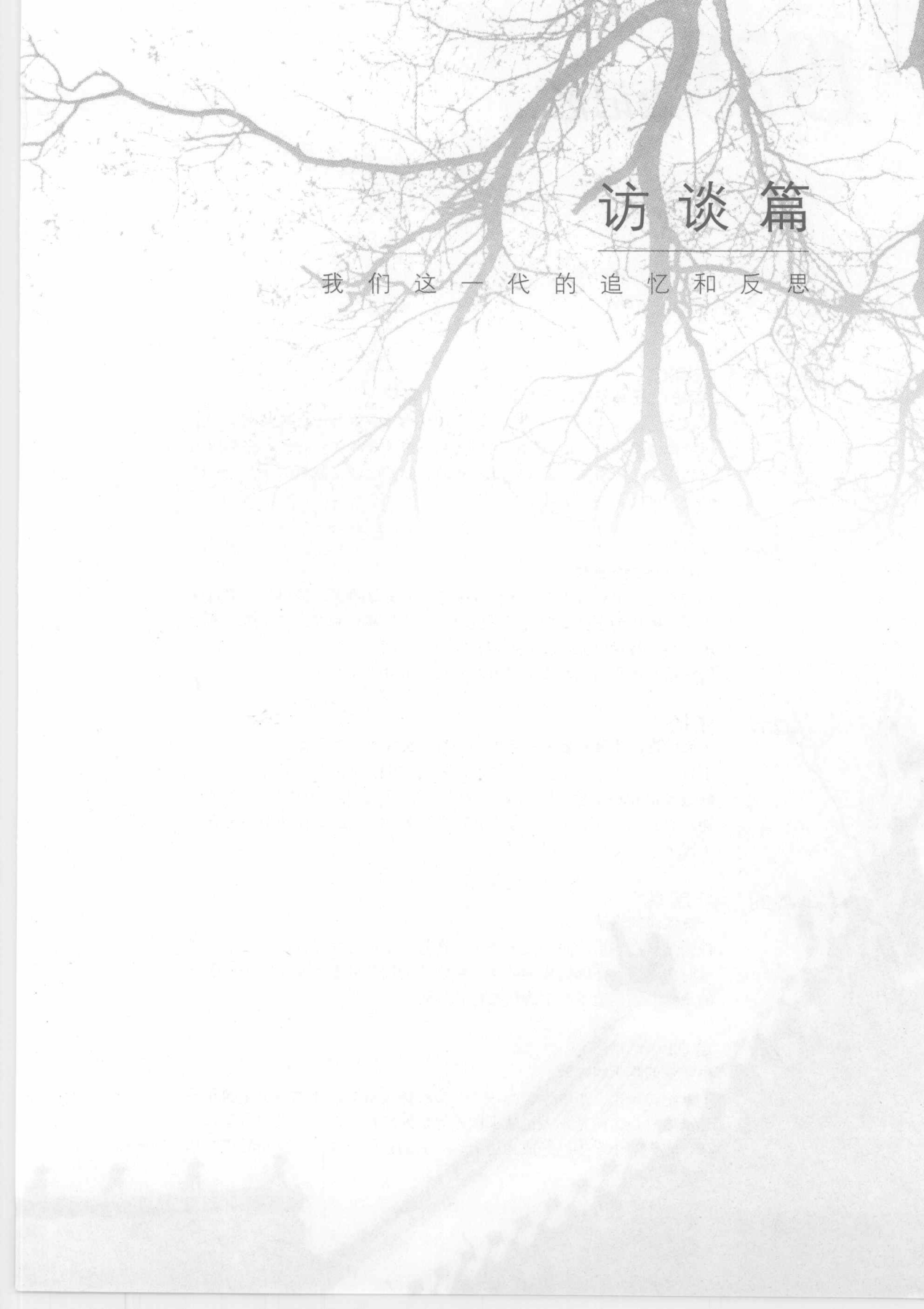
一抹淡淡的诗意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之后，汪国真用他的文字编织成的浪花赶上了文学大潮退去前的余潮，也创造了一个诗坛的特有热潮。

247 黄帅

小学生的昨天和今天

上世纪70年代，小学生黄帅作为“反潮流英雄”在北京乃至全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而她本人也从那段不寻常的经历中饱尝人世的辛酸和无奈。昨天的小学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黄帅已经是一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



访谈篇

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1978大记忆...

篇 刘淑雨 北京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那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北方工业大学任教。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我对1978年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回忆



时间：2007年11月22日 地点：东城区台基厂

刘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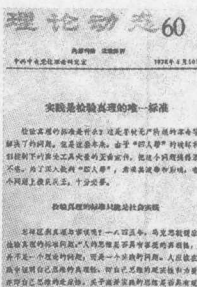
男，汉族，1913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丰县，曾用名：刘文卓。1929年考入北平师大附中高中部，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大党支部书记，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6月在上海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37年2月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秘书长。1938年深入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1941年任新山东日报社社长。1944年至1945年任滨海建国学院院长，1946年至1947年任中共滨海行署秘书长、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代书记。1949年华东局南下，留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书记。1950年任华东局青委书记。1952年至1956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78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81年3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83年至1984年任北京市第六届政协主席。1985年12月，任国家语委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87年离休。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热烈展开。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维的影响、“两个凡是”路线的禁锢，北京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很多人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北京市从真理标准讨论的兴起到补课，是当时全国情况的典型缩影。为此，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刘导生同志跟我们谈了他的亲历、亲闻、亲见。



1977年2月两报一刊明确提出“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贯彻不力”的北京市

苏峰（以下简称苏）：从社科院调您来北京市是胡耀邦跟您说的？

刘导生（以下简称刘）：时间是1978年12月。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没过多久我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北京市。因为这里差一个宣传部长，耀邦同志找我谈，他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能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北京市贯彻不力，也可能是没贯彻，或顶着不贯彻。那时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当时他的困难在于他的上面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是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

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转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文章出来后一度受到打压，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到了1978年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全国都开始在批判“两个凡是”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批判“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华国锋的调子和邓小平不一样，中央有两个声音了。可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是华国锋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听华国锋的，我想这就是林乎加的为难之处了。^[1]

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

苏：当时北京市的情况怎么样？

刘：我到北京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设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四人帮”倒台



1980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右五为刘导生）

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长期统治我党的

“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级机关。

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态度，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强留，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

迎；谁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也走了，可能是调去中央什么单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苏：来自上面？

刘：其实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



1978年12月，《大众日报》40周年在京老战友纪念会（前排左五为刘导生）

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向市委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的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

传。’”因此，他也不同意我召集这次座谈会。

当时我感到无法理解：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现在想来，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正是由于他的“两个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动，这可能也是他顾虑的原因吧。

苏：这次会上，您都说了些什么？

刘：我首先肯定了北京市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

我鼓励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要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